

香港知識分子的心態變遷

張虎
(本中心副研究員)

李普塞 (Seymour M. Lipset) 說：「我一直是在將那些創造、傳佈與應用『文化』——亦即人世間的符號世界，包括藝術、科學與宗教——的人視為知識分子。」^①李明堃在「哲人智者的沒落」一文中就各家有關知識分子的定意加以綜合歸納：「知識分子具有勇武的道德情操，面對強權傲然不屈；知識分子的『職業病』就是對現狀永不滿足、對既有秩序毫不妥協、對理想國充滿希望；知識分子具有駕馭概念和意象的本領，在抽象思維的大路上翻騰跳躍；知識分子是浪漫的社會逃兵，絕對孤獨的旅客；知識分子是意識形態的先鋒，道德標準的建築師，思想的守門人；此外，知識分子還是社會不滿情緒的催化劑，和社會變革的媒介。」^②儘管對於知識分子的定義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對於知識分子在各個社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則完全採取一致的肯定態度，香港的知識分子，當然亦不例外。

從一八四二年香港割讓英國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在此漫長的歲月裡，香港的知識分子在殖民地政府統治下的角色如何？其心路歷程又有如何的變化？本文試就香港華人知識分子在香港社會各個不同變遷階段的心態作一分析。

一、早期的知識分子

根據香港政府公佈的人口數字，一八四一年五月香港的人口是七千四百五十人，其中四千二百五十人是農民，二千人是漁民，其餘是勞工和商人^③。一八四五年六月香港總人口是二萬三千八百一十七人，其中華人有二萬二千八百六十人，佔總

① 李普塞原著，張明貴譯：「政治人」，（台北，桂冠圖書公司，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修行三版），頁二二一。

② 李明堃：「變遷中的香港政治和社會」，（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七年九月，第一版），頁三三～三四。

③ 元邦建：「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二月，初版），頁一〇。

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點九^④。但是根據當時香港三十一家英商聯名上書英國政府的報告指出：「島上只可供作香港政府及其官員駐節之地，並收容一批身無長物的貧民而已。」^⑤可見當時香港的華人仍多為勞工及農民，知識分子幾無。

至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發動起義的太平天國運動，席捲中國半壁江山，華南一帶一些有錢人士為走避戰亂逃亡香港。以後滿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暴亂，凡參加太平天國起義的勞工農民，又競相亡命香港。至一八五四年，香港華人已有一萬四千零七十二人^⑥。此時由大陸逃難來港人士之中已不乏知識分子。

雖然伴隨國內的政治動亂，已逐漸有了知識分子避難來港，唯在總人口之中仍微不足道，尙未能起著主導人民的角色。原因是，英國佔領香港以後，實行一套歧視華人的制度，其主要措施有三：(一)限制華人行動自由，晚上十一時以後，實施宵禁，華人不得夜出，違者即行拘捕法辦；(二)對華人行使笞型。除對華人執行笞刑外，尙有「遊街」、「立木籠」、「戴枷」等等；(三)限制華人居住自由^⑦。洋人社會和華人社會劃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以太平山區為起點的華人社會，分東西兩路推進，東路越過鴨八甸街到砵甸乍街為止，華人社會被嚴格限定在指定範圍之內。

儘管華人對英國的歧視及種種迫害恨之入骨，雖然也不乏零星之反抗，唯究竟不能匯為反抗力量，隨即便被壓制下去。而港英當局根本也不把這些華人反抗放在眼裡，故絲毫未對華人的反抗有妥協和讓步。究其原因，乃乏知識分子的領導。

至一八八〇年代，香港轉口港的地位已逐漸形成。隨著香港經濟的提升，香港華人的經濟勢力亦隨之發展。從而華人的政治地位亦因而改善，並且受到港英當局的重視。

歷來香港立法局都是歐洲人的天下，從來沒有華人議員的出現。一八八〇年一月，第一次有華人議員出現在立法局，那就是華人議員伍廷芳。

伍廷芳是廣東新會縣人，十三歲進入香港聖保羅書院，一八六二年畢業，一八七四年赴倫敦林肯法律學院學習，並取得大律師資格，一八八〇年任法官兼立法局委員。自伍廷芳以後，香港立法局一直有華人議員，而且議員人數逐步增加。一八八三年又打破自第一任香港總督砵甸乍任命第一批太平紳士以來，全為歐洲人壟斷的局面，第一次有華人太平紳士。首任華人太平紳士是黃勝，早年在馬遜學校讀書，後赴美留學。伍廷芳於一八八二年離港以後，由黃勝接替，一八九〇年黃勝退休

④ 同上註，頁一一。

⑤ 同上註，頁一一三。

⑥ 同上註，頁一一四。

⑦ 同上註，頁一一六至七。

，由何啓繼任立法局議員。何啓畢業於美國鴨巴甸醫科大學。一八九六年七月，立法局又增加一位華人議員韋玉，韋玉於一八六七年留學英國。

由於華人知識分子在香港社會的政治地位逐漸提升，促使港英當局不得不重視華人權益。一八九七年六月五日，立法局通過議案，廢除一八四二年為限制華人行動自由而實施的宵禁令。從此，香港的華人晚上外出不再受到限制。經過長達五十年的奮鬥，香港華人終於獲得行動自由的人權。這不能說與華人知識分子在香港政治地位的提升沒有密切的關係。

綜上所述，在英國進佔香港的初期，香港的華人主要是勞工及農民。金耀基亦認為「當英國於一八四二年佔領香港時，香港是一個沒有士紳的鄉村社會。」^⑧直到一八八〇年代後期，一方面由於中國的政治形勢（太平天國之亂），一方面由於香港經濟地位的提升，香港華人才逐漸有了知識分子。所以香港知識分子是在一定的政治與經濟條件之下產生的。而這個時期的知識分子大約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由中國大陸流亡到香港的知識分子，另一種是在西方受過高等教育知識分子。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由於華人經濟勢力的發展，迫使港英當局重視華人權益。從而乃有華人進入立法局擔任議員。唯港英當局所選拔的華人知識分子亦均以有西方教育背景者為主。因此這個時期活躍的華人知識分子主要反映以下特徵：（一）高級知識分子多具有西方的教育背景；（二）與港英當局關係密切；（三）對港英當局採取合作態度；（四）僅關心港人權益，沒有強烈民族意識。

二、抗戰前的知識分子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喚起了港人的民族意識，隨後由於香港華人經濟地位的提高，促使香港知識分子，不僅關心香港政治，更關心中國的政治情勢。例如一九二一年四月，廣州非常國會通過成立中華民國正式政府，制定政府組織大綱，反對北方軍閥政府，並準備在廣州國民政府領導下，組織力量聲討北洋軍閥，孫中山先生當選非常大會大總統，受到全國各地人民的熱烈擁護。香港華人在民族主義情緒激勵下，集會祝賀，遭到香港當局禁止，引起香港華人的憤慨，一方面向港英當局抗議，一方面向廣州國民政府聲援。結果香港總督在中國政府的抗議之下，公開道歉，大大鼓舞了香港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潮。

一九二五年五月，在上海掀起反對帝國主義的大風暴，迅即席捲全國各地，此即歷史上著名的「五卅運動」。港人為聲援上海「五卅」於六月十九日開始罷工，並提出六項要求，除要求改善待遇外並要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從這

⑧ 金耀基：「香港之發展經驗」，（香港，中文大學初版社，一九八六年再版），頁一〇。

些要求的內容可以看出，已遠遠超出了工人階級的局部利益，而是從整個民族的利益出發，這顯然表示有了知識分子的介入；否則純粹工人不可能有如此崇高遠大的要求。由於知識分子的加入，「秀才」與「勞工」加在一起，使得香港工人罷工行動迅速蔓延開來。

經過這次大罷工的教訓，港英當局顯然已認識到，華人力量之不可輕視。乃想採取措施，緩和港英當局與華人之間的矛盾。而具體的措施便是從華人知識分子著手，進行安撫吸納的工作。當時香港第十七任總督金文泰抵港以後，便通過香港名流與華人接觸。金文泰認為香港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華人，唯有讓華人參與香港事務，香港才有安定。換言之，如果能夠吸納華人知識分子參與政治，便可收「以華治華」之效，這正代表英國人政治手腕靈活之處。金文泰不惜突破歷來行政局不用華人的傳統，首次委任華人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第一位華人非官守行政局議員為周壽臣。此外，金文泰為擴大華人政治參與，將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由六人增加至八人，其中華人議員由二人增加至三人。為培訓華人知識分子，金文泰並贊助香港中文大學正式設立中文系。

在此期間，由於香港華人經濟勢力的強大，教育水準的普遍提升，促使香港華人知識分子，從只關心當地港人權益而開始關心香港的政治及中國大陸的情勢。香港知識分子因為辛亥革命而提高了愛國意識。由於關心國內的政治發展，以致香港的情勢亦隨著知識分子的帶動，與國內情勢亦步亦趨。換言之，這個時期的知識分子不只是關心眼前生活的改善，而且關心中國與香港的前途與命運。他們的心態真可說與國內知識分子互通聲息，此呼彼應。

三、抗戰時期的知識分子

由於中共自始便沒有與國民黨合作的誠意，因此在皖南事變之前，中共當局便已作了一旦決裂的準備。設在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早已在皖南事變前陸續撤退。例如南方局書記陳紹禹，組織部長秦邦憲，宣傳部長何凱豐以及林伯渠等均已先後邁返延安，僅留下周恩來、葉劍英等人負責地下工作，利用抗日戰爭展開對國民黨的政治攻勢。^⑨皖南事變後，國共鬥爭到達高潮，中共南方局為保護左傾文化界知識分子，並加強對國民黨進行文化統戰，乃將聚集在重慶桂林等地的文化人士分別疏散到延安、新四軍、香港和南洋。由於大批左派文化人來港，使香港成為中共對國民政府進行文化統戰的避風港。

爲了「揭露蔣介石政府消極抗戰、積極反共」以及在香港爲共軍籌募糧餉，中共在一九三八年一月特在香港利用廖承志

⑨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四冊），（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編印，一九七一年六月），頁二一九。

成立「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此外，中共為爭取國際援助，並利用宋慶齡成立「保衛中國同盟」，展開國際統一戰線工作。^⑩因此，這兩個「組織」便成了中共對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統戰單位。為走避戰禍而來香港的大批知識分子，儘管背景及立場各異，不盡是左派文化人，但是抗日的目標卻是完全一致。為爭取這批知識分子，對國民政府進行文化統戰，周恩來特別指示，對付這批文化工作者，「不能拿抗戰前的眼光看待他們，因為他門參預政治生活，已經進步了；但又不能拿一般黨員的尺度去測量他們，而是必須幫助和提拔他們前進。」^⑪為此，中共南方局特別指示廖承志、夏衍、潘漢年等人於一九四一年五月成立「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⑫。

據曾追隨廖承志在「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工作的梁上苑的回憶，在日本攻佔香港後，由廖承志、張文彬、尹林平、梁廣等周密布置安排的「秘密大營救」，在香港陷落後一個多月共救出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屬八百餘人。據說其中尚有一些國民黨軍政官員及家屬。

由於中國大陸的抗日戰爭，在這個時期確實有不少知識分子，基於民族意識，抗日情緒，來到香港避難。雖然這些知識分子政治立場各異，但是抗日目標一致。中共便利用抗日戰爭的機會，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大力對知識分子進行統戰。在此期間來港知識分子之多，可謂空前。中共確實吸收不少左傾知識分子。尤其在日攻佔香港期間，中共更是利用機會對香港知識界進行「大營救」，博得不少知識分子好感，從而轉變了立場。一般而言，在抗日戰爭時期，港九知識分子，其中由於大批係逃避日本侵略而來港，故此時港九知識分子表現了熱烈的愛國情操，對中國之民族認同躍然於紙上^⑬。

四、抗戰勝利後的知識分子

在日本佔領香港期間，日軍為減輕負擔，大批疏散香港人口，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居民被迫遣返內地。此外，在戰爭期間，遭日本屠殺或死於戰禍的香港居民尤眾。因此，至日本投降時，香港人口已大量減少，僅剩下六十萬人。

隨著日本的投降，原來離開香港的人口，又回流至港。為逃避日本侵略，匯豐銀行曾於一九四三年在重慶設立分行。戰後，匯豐銀行的人員又陸續返港，重新開業，對戰後香港經濟復甦起著重大作用。此外，華資流入香港數目亦極為驚人。單

⑩ 梁上苑：「中共在香港」，（香港，廣角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初版），頁三一—三三。

⑪ 同上註，頁七五—七。

⑫ 鄭宇碩：「香港政制及證治」，（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一九八七年初版），頁三一—六—七。

從上海一地流入香港的華資便有當時的國幣七百億至一千億元^⑬。香港在政治漸趨安定與資金充沛的支持下，一九四六年上半年，香港經濟已經逐步恢復到一定水準。從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又加快發展速度，至一九四九年底，香港已經完全恢復了做為東京與歐洲、美國之間的主要轉口港地位。

由於香港的光復，政治趨於安定、經濟日益繁榮，原先在日軍佔領期間離港華人，又紛紛返港。此時邊界開放，華人入境不受限制，也不須辦理任何手續，以致香港人口迅速增加。從一九四五年九月起，每月約有十萬人進入香港。至一九四五年底，香港人口已經增至一百萬。一九四六年增至一百六十萬；一九四七年增至一百八十萬。超過了戰前的最高指數^⑭。

戰後隨著中國政治局勢的惡化，大批知識分子又一湧而來香港。香港又一如戰前，變成各派政治立場不同知識分子文鬥的戰爭。戰後中共為發展在香港的文化統戰，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共廣東區委機關報「正報」已在香港創刊。翌年一月「華商報」在香港復刊，由左傾的鄧文釗任董事長，其餘董事儘是左派文人，如章漢夫、夏衍、饒彰風、廖沫沙、楊奇等。此外，左派刊物如「人民報」、「聰明人評論報」、「願望周刊」、「明郎」雜誌等左派刊物先後都在香港出版。中共「新華社」香港分社^⑮亦於此時成立運作。

由於國內政治局勢的逆轉，尤其在國際姑息主意與中共文化統戰宣傳的影響之下，一些立場不堅的國民黨人士亦為之動搖。一九四八年一月，一些投機的國民黨人士，如李濟琛、蔡廷鍇，以及親共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譚平山、何香凝、柳亞子等發起組織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正式在香港成立。「中國民主同盟」的沈鈞儒、章伯鈞、鄧初民等亦在中共煽動下，表示與中共合作的意願。香港這一時期，由於國內外政治局勢的劇變，以致一些知識分子，一方面受中共宣傳的影響，一方面受民族主義的驅使，誤以為中共會為中國人民建立一個民主的新中國。因此，許多在港知識分子並響應中共關於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倡議，陸續北上，盼望在未來中國的新政權裡分得一杯羹。

總之，戰後的香港知識分子，受到國內外政治局勢的影響，再加以中共的大力宣傳，除一些別有野心的投機分子之外，亦有不少民族主義狂熱人士，在中共煽動之下，不遺餘力的為所謂「新中國的延生」作出貢獻。

五、一九四九年後的知識分子

⑬ 同註⑬，頁二〇一。

⑭ 同上註，頁一一。

⑮ 葉蓄：「香港新華社發展史」，載於梁上苑：「中共在香港」一書，頁一四七～九三。

一九四九年，由於國內政治情勢的轉變，大批逃避赤禍的人士蜂湧來港。港府唯恐赤禍蔓延到香港，乃採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首先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公佈「人口登記法」¹⁶。此外，一連串法例和措施也同時出籠，例如：(一)驅除不良份子出境條例(一九四九)；(二)修定一九二二年的緊急法；(三)「公共秩序法例」——專為禁止工人罷工的法案；(四)「社團登記條例」¹⁷。

除以上各項法例外，港府為限制中共人員滲透來港，於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憲報」公佈新修訂的移民條例。四月二十八日公佈「一九五〇年移民管制(第二號)(補充)條例」，規定「只有經香港政府批准的外交人員，可以豁免入境管制」¹⁸，亦即凡來自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人民入港，必須取得入境證始能入港。當時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為此曾提出強烈抗議，指港府此一措施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人民不合理與不友好的行為」¹⁹。儘管如此，港府對中共的政策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又宣佈實施「一九五一年邊境封閉區域命令」，規定「進出『封閉區域』或停留的人都領通行證」²⁰。由於港府對來自中國大陸移民的種種限制，再加以中共在背後的煽動，以致在此期間引發不少暴力衝突，其要者如：「三十八團體事件」及「羅素街事件」，一時間造成香港不少的社會動亂。

在此期間，除以上之社會事件之外，「兩航事件」²¹發生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當時「中航」總經理劉敬宜及「央航」總經理陳卓林叛變，率領十二架飛機投共，中共國務院隨即宣佈接收「兩航」資產。唯至十一月二十四日，中華民國政府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凍結「兩航」資產和飛機。隨後經過兩年半的訴訟，終於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判決「國民黨有權作出兩航之買賣」，中共敗訴。當時英國樞密院在裁決時說：「此次是共黨在遠東的首次失敗」²²。

在「兩航」業權爭訟期間，九龍城東頭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發生大火，導致上萬人無家可歸。中共乃趁機以救災為由，從廣州市派出多個團體組成所謂「粵穗慰問團」，欲來港慰問災胞。港府為阻止暴民湧入香港，除加強軍警佈防於羅湖、上水至尖沙咀一帶外，並通知中共禁止慰問團入境。隨即爆發警民流血衝突。流血事件發生後，中共「人民日報」發

¹⁶ 「香港與中國」(歷史文獻資料彙編)，(香港，「廣角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再版)，頁四、五。

¹⁷ 同上註。

¹⁸ 同上註，頁九。

¹⁹ 同上註。

²⁰ 同上註。

²¹ 「兩航」是指「中國航空公司」(簡稱「中航」)，及「中央航空公司」(簡稱「央航」)。

²² 同上註，頁一〇。

表短評，向港府強烈抗議，香港「大公報」全文轉載。於是港府乃控告「大公報」負責人黃彝民等三人攻擊英國殖民地政府，此即所謂的「大公報事件」。雖然幾經訴訟，獲判「不起訴」處分，但已使中共與港英政府的關係惡化到空前地步。

據統計，至一九五二年香港人口已有約二百五十萬人，而人口增加的根源，主要來自中國大陸。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其中即不乏眾多的知識分子。據李明堃的分析，從一九四九年至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增加了許多由大陸來港的大學教授、大學生及其他知識分子，透過興辦教育，出版刊物等方式「對香港的下一代傳遞了對學術文化的尊敬，輸送了對國家民族的熱愛。」²³但是這些知識分子大多是逃避赤禍而來港，加以當時處在東西對立之間的香港政治環境，以致此時的香港知識分子反共意識特別強烈。

六、「文革」後的知識分子

至六十年代初，許多由青年學生組織成的「文社」突然出現，每個「文社」各有刊物，而各個刊物的風格亦有不同，有文藝性的，有政治性的，也有經濟性的。部份「文社」成員後來成為香港學運的中堅分子。除「文社」之外，香港大專學生並組成社會工作隊，利用假日課餘義務從事社會居住環境的服務，協助道路及堤壩的修建。一方面藉此深入社會了解真情實相，同時舉辦討論會，出版各種雜誌，多方面探討香港的社會百態。如果說香港人有國家民族意識，可能便是在這種氣氛下培養出來的。

六十年代初期，香港青年學生和社會知識分子的注意焦點放在香港內部事務上，至六十年代中期以後，由於中國大陸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香港也因而引發了六六和六七年的大暴動。接踵而至的社會衝突對大專學生產生強烈衝擊。五十和六十年代培養起來的社會和國家民族意識因「文革」的「爆發」而一發不可收拾。從六十年代後期到七十年代，香港學運經歷了「大學校政改革」、「中文成為法定語言」、「保衛釣魚台」和「反貪污、捉葛柏」等運動。其中「中文法定」及「保釣」固不在話下，即使在爭取學生權益或參與關心的社會事件中，也仍然含有極濃後的反殖民地的國家意識。「保釣」之後，香港學生開始對國家意識的模糊體認轉向對於「中國」及「香港與中國關係」等迫切具體問題上作出認真的反省。從浪漫的熱情轉入冷靜理智的反思。此時大專以上聯會提出了「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口號。同時，學運裡也出現了一「國粹派」、「社會派」和「托派」之間的論爭²⁴。這些論爭曾在「學苑」、「盤古」等大專學生刊物掀起激烈論辯。「打倒四人幫」之後

²³ 李明堃：「哲人智者的沒落——香港知識分子的社會政治角色」，香港明報（一九八一年七月號），頁三六—九。

²⁴ 徐是雄：「香港高等教育面臨的挑戰」，載於王廣武編「香港教育制度全面檢討」，（香港，金陵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

，大陸政治形勢急轉直下，國家民族等價值觀念突然變得不著邊際，成為脫離現實的概念，學運就像虛脫的運動員，虛脫不振。

八十年代初期，學運面臨了舊的價值標準崩潰，而新的價值觀念尚未建立的「真空」狀態。這種價值觀念的「真空」，迅即被資本主義社會以個人為本位的功利主義取而代之。從六十年代，經過七十年代，到了八十年代，香港知識分子結束了過去在社會文化中自我疏離的處境，走向和殖民地政府，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文化合作妥協的道路。「六四天安門」的哀嚎，雖然一度喚起了香港青年知識分子的國家民族意識，但是迅速又在「九七」大限的浪潮中被淹沒。

七、結 語

或許由於經濟上傲人的成就，使香港人，尤其知識分子，滋生了一種自滿、自傲的心態。香港人看不起大陸人，也曾經看不起臺灣人。對於海峽兩岸，香港的態度往往是隔岸觀火，冷嘲熱諷，「東彈彈，西唱唱」，很少聽到他們對殖民地的批評²⁶。香港知識分子在步入八十年代以後，已逐漸失去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熱情。他們雖然學會了西方知識分子的灑脫，卻沒有學到西方知識分子自我批評的精神。來自大陸的「表叔」雖窮，但是拳頭大，面對「九七」，香港知識分子的心態只有「無奈」了。極端的重商主義，使香港人追求的最大目標變成單純的「賺錢」；長期的殖民主義教育，使香港人很少有什麼「公民意識」。而對即將來臨的大變局，香港知識分子，除了無奈再也沒有更好的選擇了²⁷。

②5 周魯逸：「香港學生運動的特點及評價」，載於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一月，初版），頁二七八—二八三。

②6 若明：「社會變革期中的知識分子」，九十年代（一九八九年四月號，香港），頁九一—二。

②7 同上註。